

树立战略思维拓宽发展视野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调查报告

浙江在外投资创业人员是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对浙江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全面摸清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情况，根据省委主要领导的意见，省委政策研究室组织 11 个市、6 个省直部门、7 个省政府驻外办事处、7 个县（市）就浙江人投资创业情况进行专题研究。期间，我们会同省政府办公厅、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省工商局组成四个调研组，分别赴东北三省、湖南、河南、山东、江苏、贵州、云南等省实地调研，并对在外 1000 家浙江企业和省内有对外投资的 1000 家企业进行抽样调查。现将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总体情况

浙江人历来有外出务工经商的传统，历史上，宁波帮、龙游商帮等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人口跨区域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但仍有一大批浙江人在全国各地务工。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浙江人走出去投资创业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领域不断拓展，地域不断扩大，走出了一条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从国内到国外的对外投资创业之路，形成了独特的浙江经济现象。

综观浙江人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投资创业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一大批浙江人，主要是浙江农民，迫于生活压力，在人口跨区域流动限制有所松动的条件下，纷纷到全国各地从事修鞋、弹棉花以及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等务工活动。80 年代中期以后，我省外出务工人员特别是小商小贩和乡镇企业的供销人员迅速增加。这批人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不以利厚而趋之，不以利薄而弃之，实现了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到 80 年代后期，其中一部分人开始在省外经商办企业，从事商品销售等经营活动。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 年浙江常年在省外务工经商人员达 100 万左右。这一阶段，浙江在外人员主要是“做别人不愿做的事”。

二是整个 90 年代。随着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民间资本的不断积累，浙江人没有小富即安，而是拿着 80 年代掘到的第一桶金，敢于冒险，敢于拼搏，继续在全国各地开辟市场，先后在省外创办了一大批“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台州街”等，并开始从事服装、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行业投资，进行“销地产”。同时，一部分浙江的大企业，如娃哈哈等开始在中西部进行大规模投资，显示出浙江人厚积薄发的态势。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 年浙江在外务工经商人员达 207 万左右。这一阶段，浙江在外人员主要是“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三是 2000 年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的先后实施，以及省委实施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战略决策，一大批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北上南下、挺进中原、征战西部、抢占上海滩，在商贸物流、基础设施、旧

城改造、教育科技、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以及国有企业改造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大手笔开发、大资本运作，实现了从商贸流通、商品生产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的新跨越。据本次调查 截止 2003 年底，浙江在外务工经商人员达 400 万左右，其中经商办企业人员约 200 万 在外企业约 9 万家 个体工商户约 70 万户 注册资金约 2350 亿元，对外投资累计约 5320 亿元 其中从浙江输出资金约 800 亿元 2003 年营业收入超过 1 万亿元。这一阶段 浙江在外投资创业人员主要是“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

从调查情况看，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有五个基本特征：

（一）从区域分布看 浙江的对外投资 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多。调查显示 在外浙江人的足迹覆盖了全国 30 个省市，但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据初步统计，到 2003 年底 在北京、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江苏、福建、海南等 8 个省市 浙江人累计投资约 3300 亿元 约占浙江人在外投资总额的 62% 其中上海 1700 亿元 约占总额的 32% 东北三省累计投资约 420 亿元 约占浙江人在外投资总额的 8% 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西等 7 个中部省份累计投资约 820 亿元 占总额的 15.4% 四川、云南、新疆、青海等 12 个西部省份累计投资约 780 亿元 约占总额的 14.6%。

（二）从投资领域看，浙江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浙江对外投资的领域近 10 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 年以前，浙江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商贸流通。2000 年后 浙江对外投资的领域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 触角已伸向农业、工业、建筑、房地产、商贸、物流、餐饮、基础设施等各行各业 但仍以第三产业为主。据对 1500 家在外企业的抽样调查，从事第一产业的 38 家 占总数的 2.5% 投资总额约 10 亿元 占总额的 2.3% 从事第二产业的 612 家，占总数的 41% 投资总额为 154 亿元，占总额的 33.6% 从事第三产业的 850 家 占总数的 56.7% 投资总额为 293 亿元 占总额的 64%。据上海办事处调查，浙江在上海的投资，三产比重达 70% 以上 据温州市统计 温州人在外从事三产的比重约为 83%。考虑到 2000 年以前浙江在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估计我省在外投资总额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占 75% 以上。

（三）从资金来源看，浙江对外投资的资金主要是早期在外经营的积累。根据我们调查，80 年代浙江在外创业人员主要从事务工活动，资金输出极少。90 年代浙江输出的资金逐步增加，但总量也不大。2000 年以后，随着浙江对外投资逐步从商贸流通为主向制造业、房地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等领域拓展，浙江输出的资金大幅度增加。但总体上看，浙江对外投资的资金主要是多年在外经营的积累。据温州调查，温州在外投资总额近 2000 亿元 其中本地输出资金约 500 亿元；据上海办事处调查，浙江在上海的 1700 亿元投资中，浙江输出的资金约 400 亿元 深圳办事处反映 浙江在深圳的投资约 250 亿元，其中浙江输出资金为 15 亿元 据对在外的 1000 家企业的抽样调查，当地金融机构的贷款约占企业总资产的 12% 当地人的投资额约占企业所有者权益的 9%。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判断，在浙江对外投资总额中，浙江输出的资金大约占 15% ~ 25%，当地金融机构的融资约占 10% ~ 15%，5% ~ 10% 是当地人的投入，50% ~ 70% 是浙江人多年在外的经营积累。

（四）从企业规模看，浙江在外企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根据外省工商局反馈的资料，我省在山东、云南、湖南、广西等 13 个省区中 共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149501 户 其中 个体工商户为 110432 户 占 73%。据我们对在外 1000 家企业的调查分析 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下占 35% 年销售收入 500 ~ 1000 万元的占 14%，1000 ~ 3000 万元的占 26%，3000 ~ 5000 万元的

占7%,5000~10000万元的占8%,1亿元以上的占10%。考虑到我们调查的企业都是当地规模较大的企业,实际上中小企业的比重远高于抽样调查揭示的情况。

(五)从经济关联度看,浙江在外企业与浙江经济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据各地调查,我省在外从事商贸流通业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的产品70%以上产自浙江,估计年营业额在2500~3000亿元左右,约占省内相关产业产出的30%。抽样调查表明,在外企业中,原料或货源来自浙江比例超过50%的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34%,30%~50%的占22%,10%~30%的占22%。产品返销浙江比例在50%以上的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8%,30%~50%的占12%,10%~30%的占26%。进一步分析表明,我省在外企业中,以拓展市场为主要目的占企业总数的66%,以获取原材料为主要目的占14%。同时,相当一批企业将部分利润汇入浙江,或做强做大后返回浙江投资。据黑龙江省工商局统计,在黑龙江的浙江创业人员汇入浙江的现金总额近几年累计达22.4亿元;据山东省工商局统计,在山东的浙江企业近几年返回浙江投资累计约15.5亿元,约占在鲁浙江企业注册资金总额的17%。据台州市统计,2003年全市吸引回归资金43亿元。

总体上看,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情况是好的,发展也比较快,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我省各地对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认识不统一,一些地方对外出投资创业态度比较消极,使不少在外投资创业人员得不到本地政府的支持和服务。二是省外部分地方投资环境不尽理想,使一些浙江在外投资创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三是在外浙江企业联合会覆盖面还不够广,在督促企业自律、强化信息沟通、服务在外人员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对这些问题,我们应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以确保我省对外投资创业的健康发展。

二、正确认识浙江企业和投资创业人员“走出浙江”现象

如何看待数以百万计的浙江投资创业人员和数以万计的浙江企业走出去现象,目前全省上下认识不一,还有不少误区。一些人简单地把企业“走出去”看作是资金外流、税源外流、人才外流,并认为会造成本地产业空洞化,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利,政府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还有一些人认为企业走出去是企业行为,应顺其自然,政府不必过问。我们的研究表明,浙江人走出去务工经商办企业,既是浙江经济迅速发展的必然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大批浙江人走出去务工经商办企业,使浙江较早地熟悉了国内市场的特点及竞争规则,较早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较早地形成了一支创业大军和企业家队伍,并广泛传播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可以说,没有一大批企业和创业人员走出去,就没有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企业和投资创业人员走出去虽然有利有弊,但总体上利大于弊,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浙江自身发展要求,符合企业自身扩张需要。

(一)浙江企业和创业人员“走出去”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使然。跨国或跨地区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1979年,英国经济学家邓宁通过对67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时,基本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当人均GNP在400—1500美元之间时,开始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在1500—2500美元之间时,对外直接投资会不断增加;在2500—4750美元之间时,对外直接投资会快速增加。如1977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对外投资开始启动,当年约为0.2亿美元;1988年韩国

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 当年对外投资达到 4.8 亿美元 ;1997 年韩国人均 GDP 约 10000 美元 对外投资达到 44.5 亿美元。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对外投资在 1998 年达到最高点 (47.4 亿美元) 后开始下降,1999 年为 25.5 亿美元,2000 年为 37 亿美元,2002 年为 26.7 亿美元。尽管邓宁的研究是针对跨国投资的,但也基本符合一国内部的跨地区投资。有关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内部由于没有关税、汇率以及税制差异、利率差异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制约,地区间的资本流动远比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活跃。这意味着一国内部的跨区域投资在人均 GNP 低于 2500 美元时就可能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03 年 浙江人均 GDP 超过 2400 美元 专家估计我省人均 GNP 已超过人均 GDP。按照邓宁的理论,我省正处在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阶段。因此,浙江企业和创业人员大规模走出去投资创业,总体上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这里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浙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资本等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比较小,这使得浙江对外投资的规模和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均 GDP 与浙江接近的省份,甚至高于人均 GDP 大于浙江的省市。

(二) 浙江企业和创业人员“走出去”是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经过改革开放 25 年的发展,浙江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成为沿海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但同时我省原有的一部分优势也在逐步弱化,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和素质性矛盾以及要素资源制约等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土地资源紧张,可转为建设用地的耕地总量仅 334.6 万亩 水资源紧缺 结构性和水质性缺水现象比较明显;矿产资源贫乏,许多矿产资源储备量在全国各省市区位居后列;环境容量较小 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 劳动力成本、商务成本等不断攀升 电力等重要原材料供给日趋紧张 据省有关部门调查 我省综合商务成本与上海相比 从 2002 年低于 16.2% 缩小到 2003 年的 10.2% 与江苏相比 从 2002 年高于 8.4% 扩大到 11.9%)。这些问题,一方面制约了浙江纺织、服装、制鞋、印刷包装、日用小商品、小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的水平扩张 另一方面制约了水泥、化工等资源加工型产业以及能耗、水耗、地耗和环保要求较高的产业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在土地等资源要素硬约束的条件下,大量低附加值产业的扩张和集聚,必然要影响精深加工型重化工业、高科技等产业的发展。本次调查显示,我省在外工业企业年产值合计超过 1500 亿元。如果这些企业都在省内,以每亩产出 100 万元计(全省开发区平均为 47 万元/亩)至少要占用 15 万亩土地 以每 100 万元工业产值耗电 4 万千瓦时计(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平均 100 万元工业产值耗电 5 万千瓦时)至少要耗电 60 亿千瓦时。因此 要缓解要素制约 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必须鼓励、支持、引导部分产业和企业有序地走出去,特别是把部分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以及环保要求较高的产业转移出去,腾笼换鸟,将有限的发展空间让渡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产业。退一步说 即使没有土地的制约、环保的制约、能源的制约 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低附加值产业也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走出去。因为这些产业劳动用工多、职工收入低,不走出去,一方面会影响我省企业职工平均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会造成外来劳动力不断增加,导致我省经济增长的各项人均指标滞后于总量指标,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城乡居民难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 浙江企业和创业人员“走出去”是企业自身扩张的内在需要。资本的本质是逐利 其流动增值没有国界、省界 企业是资本的载体 需要在跨区域的要素整合中获取新优势、实现新扩张。从世界范围看 所有的大企业都是跨国经营的 从我国范围看 除石化、钢铁等行业部分

企业外 所有的大企业都是跨区域经营的 从我省的实践看 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时 其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突破原来的区域向外拓展。另一方面，资本逐利的本质，又使得不同规模的企业都会向要素成本低、政策优惠多、发展空间大、配套条件好、经营利润高的地方集聚 并通过 对资产、土地、品牌、商业网络等要素的重新组合来推进结构调整。有些企业由于其产品的特殊性质，必须在全国各地布点。如水泥行业，一般销售半径仅几百公里，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若要继续扩张，必须走出去再建新厂。部分饮料行业也有这个特点，如饮用水。有些企业做大后 为了构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营销网络 也必须走出去布点 如服装、日用小商品等。还有一些产业 由于其产品只能就地消费 不可运输 企业要扩张也必须走出去 如房地产。更多的企业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虑，走出去投资办厂。此外，企业成长后若要向矿产开发、水利开发等特殊领域拓展，也必须到有资源的地方去。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发展之路就是企业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总体处于卖方市场的背景下，我省许多企业从零起步 凭借机制上的先发性优势 利用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 在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达到了一定的规模。1978 年我省年销售上亿元的工业企业寥寥无几 去年已接近 2000 家 其中年销售上 10 亿元的企业近百家。这些企业，一方面已经具备了走出去投资的条件，另一方面，其中有相当一批企业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如广厦、万向、娃哈哈、雅戈尔、正泰、德力西等企业 都经历了成长、走出去、进一步壮大的过程，目前分列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第 6 位、第 7 位、第 11 位、第 12 位、第 13 位和第 15 位。杭州华立近几年走出去收购兼并了重庆仪表、恒泰、昆明制药等 3 家上市公司，并在省外组建了多家企业，目前名列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第 24 位。上海埃力生集团原为慈溪一家从事轻型钢管生产的企业，1997 年迁至上海 去年营业额达到 450 亿元。

但我们也要看到，大批企业走出去投资创业，必然会给浙江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看待负面影响，关键是二个问题：

第一，企业走出去后腾出的发展空间，是否有相应规模的高技术制造业、新兴服务业等产业来填补。如果腾出的发展空间仍由传统产业来填补，企业走出去就没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功效。因此，企业走出去负面影响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省高技术制造业、新兴服务业发展的快慢。

第二，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后，是否会回浙江投资高技术制造业或新兴服务业。这里如果不考虑企业自身因素，主要是看浙江是否有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及新兴服务业的环境、氛围和条件。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省相当一部分企业做大后把总部迁往上海等地，这也要看浙江是否能够逐步形成有利于大企业总部运作的环境、氛围和条件。

三、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浙江人走出去投资创业的建议

在外浙江投资创业人员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参与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战略选择。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以战略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务实的态度 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鼓励、引导浙江人走出去投资创业。

（一）理顺管理体制。参照上海做法 建立由省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省经济技术协作办、省工商局、省工商联等省级有关部门为成员的国内经济合作交流联席会议制度，下设办公室，主要职责是情况综合、政策研究、联络协调，并检查督促联席会议确定的各项重点工作的进展情况

况。外出投资创业人员比较多的市也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二) 建立健全高层互访磋商机制。每年有计划地安排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队的党政代表团到我省在外投资创业人员比较集中的省份考察,进行高层交流。同时,通过建立友好市、友好县等形式,进一步加强县、市之间的交流。政府有关部门也要加强与外省市的工作沟通。

(三) 加强在外企业联合会或商会建设。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争取在2年内在全国各省市(除西藏)都成立浙江在外企业联合会。积极引导在外企业及各市县商会加入浙江企业联合会,进一步规范组织体系,完善组织功能,提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协调、自我服务的能力,及时为浙江在外企业和创业人员提供信息、咨询、协调、维权以及融资等方面的服务。在此基础上,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浙江在外企业联合总会。省政府各驻外办事处要加强对所在地浙江企业联合会的指导,积极主动地做好在外浙江企业和创业人员的服务工作。

(四) 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全面落实《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继续实施《关于我省参与西部大开发工作的意见》,用好省财政每年500万元的专项资金;研究制定我省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建设的政策,对走出去开发省外资源的企业予以一定的政策补贴。加强对外创业人员政治上的关心,各地在推举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人选时,应考虑有突出贡献的在外创业人员。建议省政府在适当时候举办“浙江在外创业人员经验交流会”,表彰一批在外优秀企业和创业人员。

(五) 加强对外在企业和创业人员的服务。加快“三网三库”(政府联系网、系统联动网、企业联络网、信息库、数据库、项目库)建设,加强对省外各地政策动态和信息动态研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继续主办“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和“中国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完善合作交流平台;加强对外在创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在外浙江人的诚信意识、经营水平和维权能力。

(六) 加强舆论宣传。充分利用省内外多种媒体和宣传手段,多渠道、多形式宣传介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树立浙江人“讲诚信、善经营”的良好形象,不断提高省外各地对浙江和浙江人的认知度。省内各新闻媒体要加大对“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宣传力度,开辟《浙江人在全国》的专栏和专题系列节目,大力宣传在外浙江人的成功经验和创业业绩,为在外浙江创业人员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

(七) 积极引导在外浙江人回乡投资。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外企业和创业人员呼声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是我省的投资环境还不尽理想。据省统计局调查,有59.6%的在外企业认为我省要提高政府服务意识,58.4%的在外企业认为要简化投资手续,42.2%的在外企业认为要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对此,我们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抓紧研究制定吸引在外浙江创业者回乡投资的若干意见,对回乡投资的企业和创业人员在企业登记发证、土地使用、税收征收、供水供电、融资贷款、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一定的政策倾斜,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省委政策研究室)

对“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问题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浙江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跨区域经济流动,大批浙江人相继到全国各地投资创业,谋求发展,对全国以及浙江本省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这一现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是否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某种规律?它是否会给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各级党委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积极引导这一现象,促进浙江经济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省委党校组织了专门课题组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现将我们的分析及若干对策建议报告如下。

一、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历程

(一)悠久的外出创业传统。浙江人素有外出创业的传统。在浙江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绍兴师爷、“宁波帮”、“龙游商帮”等外出创业群体。而浙江各地众多的能工巧匠,如东阳木匠、永康铁匠等,也往往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近代,浙江商帮的活动区域曾遍及全国各地。20世纪30年代,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说:“其营业区域在长江南北,且利用交通之便,进而蔓延各地,其大本营在上海、汉口二处,而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亦在势力范围之内。”在解放前,浙江商帮在全国具有显著的地位。

由于地处沿海,浙江一直是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前沿,宁波(古称明州)、温州乃至杭州、台州长期以来都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与对外通商口岸。由于对外经济交流相对频繁,浙江人漂洋过海、出境创业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在近代,浙江的国际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在20世纪30年代,浙江一批有实力的工商企业家经由沪、甬转往香港、澳门等地投资,经商办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批浙江人随陈仪接收台湾。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又有大批浙江人随国民党去了台湾。长期的对外经济交流使浙江成为全国著名的侨乡,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数量在全国居于前列。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浙江人、浙江企业外出创业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发展环境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发展环境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外出创业的浙江人、浙江企业数量明显减少。除了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知识青年下乡“支农”、“支边”运动外,浙江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除了部分企业在政府的计划下拆迁到内地外,基本上没有浙江企业外出投资创业。但是,由于浙江人多地少,就业压力大,为了生存,加上长期外出经商创业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些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如温州的弹棉郎、义乌的“敲糖帮”等地域性商人群体,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继续跨区域流动。在义乌,当地农民在经得生产大队、公社的许可后,可以在农闲季节持有政府开具的许可证到省内外收购鸡毛和各种废品。从这一时期浙江外出口口的地理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温州、台州、义乌、东阳等人地矛盾突出、生存压力较大的地区。杭州、嘉兴、湖州等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外出口口的数量相对较少。由于这些走南闯北的浙江人经济观念强,对市场的反映快,他们带回的各种市场信息,直接导致了浙江许多专

业市场与特色产业的发生与发展，从而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永嘉桥头的钮扣市场与钮扣产业、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与小商品生产、柳市的低压电器、苍南宜山的再生腈纶产业都是在当地外出口口的推动下形成的。

(二) 20世纪80年代浙江人的务工经商与企业的横向联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人口流动逐年增加。20世纪80年代，随着相关政策的松动，如个体经济被“正名”、传统集贸市场的全面恢复、农民从事非农产业限制的逐步放开、允许社队集体、农民个人进行长途贩运等，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各种壁垒逐渐被打破，导致越来越多的浙江人走出浙江外出创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外出到全国各地创业打工的达200多万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这一时期浙江人外出创业的起点相对较低，主要从事商品销售、弹棉花、磨豆腐、配钥匙、卖眼镜、理发、补鞋等行业。与此同时，浙江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浙江人向外流动。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必须自己找原材料，找市场。浙江作为一个资源小省，原料与市场两头在外，导致浙江的大批采购员、推销员在全国各地满天飞，在计划经济的空隙中为企业的发展寻找生存的空间。许多外出打工创业的浙江人也纷纷为家乡的企业提供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或者直接成为家乡企业的经销、采购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为促进区域经济联系，国家鼓励和提倡以企业为主体的横向经济联合。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下发了一系列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针对浙江经济发展与资源分布格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区域经济协作与横向联合。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企业和省外企业之间横向联合发展迅速。许多浙江企业如雅戈尔、罗蒙、培罗成、金洲、纳爱斯、茉织华等，通过与上海企业的横向经济联合，得到上海企业在资金、技术和订单等方面的支持，从而进一步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大量的企业通过与省外企业的横向联合，得到企业生产必须的各种能源和原材料。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一些建筑企业开始组织力量到省外尤其是上海承揽业务，在实现企业扩张的同时，也带动了大量劳动力外出。一些浙江企业开始在省外尤其是上海租赁摊位，开设产品销售的“窗口”。外出创业的大批浙江人也纷纷租赁摊位，销售各类浙江产品。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多数企业规模都较小，受经济实力的限制，进行跨区域投资的很少，基本上没有跨国投资。至1990年，浙江企业在外国只有一家贸易机构。

(三) 20世纪90年代外出投资创业才真正开始起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为大量浙江人的跨区域流动与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扩张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积累，浙江外出创业人员逐步从低层次的营销、服务转向市场建设与实业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浙江人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北京京温市场、成都荷花池市场、昆明螺丝湾市场、哈尔滨温州国际商城、乌鲁木齐义乌商贸城、兰州义乌商贸城、上海轻纺城、郑州温州商城等一批大型专业市场。专业市场的兴建不仅带动了更多的浙江人外出创业，也促进了浙江商品在外地市场的销售。随着外出浙江人口的不断增加，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浙江村”、“温州城”、“台州街”、“义乌路”。一批在外投资创业人员逐步在当地站稳了脚跟，有的浙江人甚至变更了户籍所在地。

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展，许多浙江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一些浙江企业开始进行跨区域扩张。1992年，浙江的一家民营企业桐

庐皇家实业有限公司老板陈金义出资 145 万元买下了上海黄浦区 6 家国有商业企业的经营权，一时轰动全国，被媒体称为“陈金义现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批浙江企业如娃哈哈、纳爱斯、正泰、德力西、雅戈尔等，为了加强对外地市场的服务与管理，纷纷在外地投资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形成全国性的营销网络。一些中小企业也纷纷在市场所在地建立营销网点。而一些以出口为主的浙江企业，如飞跃集团、宝石集团等，纷纷在国外投资设立各种贸易机构。到 1999 年，浙江企业在国外已经有 300 多家贸易机构。

在当时国家有关对口支援、对口帮扶政策的引导下，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积极鼓励下，一些浙江企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省外进行生产性投资。如从 1993 年开始，为响应农业部提出的“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浙江省相应成立了乡镇企业东西合作领导小组，鼓励浙江有实力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搞开发合作，向河南和新疆推出了近百个合作项目，带动了许多企业在河南和新疆进行投资。在国务院号召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确定浙江省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涪陵市以后，在省市政府部门的积极组织推动下，娃哈哈集团、金义集团等一大批浙江企业先后在涪陵投资办厂，参与库区建设。在国务院组织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确定浙江省对口帮扶四川的广元、南充两市之后，也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娃哈哈集团、青春宝集团、人本集团、一体童装等企业先后在广元和南充进行投资，参与当地建设。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竞争的激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开始走出浙江，在全国各地投资。如娃哈哈自 1994 年以来，投资 10 多亿元，先后在重庆、四川、湖北、安徽、河南等 10 多个省市区建立生产基地。华立集团通过一系列地跨区域投资、收购、兼并，不仅控股三家上市公司，而且实现了多元化扩张。雅戈尔自 1995 年以来，先后投资 5 亿多元，在全国建立了 300 多家直营的专卖店，成为全国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一大批浙江企业通过跨区域扩张，实现了从区域性企业向全国性企业转变。正泰、德力西、康奈、庄吉等企业先后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成为无区域企业集团。而浙江的一些外向型企业，如万向集团、海天集团、茉织华集团，为了更好地占领国际市场，开始进行跨国的实业投资，在国外建立生产、装配基地，逐步向跨国公司转变。可以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扩张才真正起步。为了加快企业的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获得更高的利润，许多浙江大企业、大集团走出浙江，在北京、上海甚至是美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利用外地的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加快企业产品的开发，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随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商务环境的变化，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浙江的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商务成本等原因，开始通过跨区域投资进行战略转移，甚至是整体的迁移。如 1997 年，温州 100 多家灯具制造企业，整体搬迁到广东古镇。近年来，平阳编织袋生产企业不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浙江的一些大企业、大集团由于本地发展环境的限制，把企业的总部，或者是企业的重要职能机构如投资中心、财务中心等搬到外地。如 1999 年，杉杉集团把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在浙江的反响很大。后来，浙江又有许多大企业、大集团，如宁波的天一证券、埃力生、宏润建设、龙元建设，温州的天正集团、均瑶集团，嘉兴的茉织华集团等，把企业的总部迁到了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的一个经济中心，沪浙经济联系历史悠久，关系密切，所以现在搬迁总部的浙江企业一般都把总部搬到上海。

这些企业虽然搬迁了总部，但一般都把生产基地留在浙江，从而形成总部在上海、生产基

地在浙江的企业格局 企业上海接单、决策 在浙江生产。

(四) 21世纪全面走出浙江。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浙江的经济总量与人均 GDP 一直稳居全国前列。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加上政府的大力推动,从 2000 年开始 有越来越多的浙江人、浙江企业“走出浙江”到全国各地投资创业。浙江人、浙江企业外出创业的形式越来越多,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浙江许多大企业、大集团纷纷在外地进行生产性投资 2002 年浙江百强企业有一半以上在投资所在地有投资项目。纳爱斯集团、奥康集团等企业是从 2000 年开始进行跨地区投资。一批浙江企业根据国家“走出去”战略与浙江省“两个推动”战略的鼓舞下开始进行跨国投资,温州的康奈集团、奥康集团先后在美国和西欧开设专卖店。浙江人外出创业也逐渐由务工经商向投资实业转变。浙江人与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扩张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现象,受到了全国的关注。许多省市,如四川、江西、云南、新疆等,都把浙江作为一个重要的招商引资对象,纷纷到浙江进行招商引资。

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商务环境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地方的商务成本不断上升,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目前,省内工业用地地价昂贵,而且由于土地指标紧缺,工业用地供不应求,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大量的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不断向外地迁移。近年来,省内的供电、供水形势也十分紧张,明显影响了许多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地工人的工资不断上升,也影响了浙江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由于浙江经济发展环境的一些不利因素,一些浙江企业开始进行整体搬迁,或者搬迁企业总部。据浙江省工商局初步统计,目前全省共有 3058 家民营企业外迁,其中整体外迁 488 家,总部迁移 2488 家,全省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 226.3 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 453.5 亿元,上缴税收 25.1 亿元,分别占全省个私经济总产值的 6.1%和税收总额的 12.8%。浙江企业外迁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近年来,浙江人、浙江企业外出创业的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政府部门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自 1999 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从 2000 年开始,连续 5 年,带领浙江企业家到中西部地区考察、投资。2000 年 8 月在新疆、甘肃,浙江企业在 163 个项目中投资了 63 亿;2001 年 6 月在四川、云南,浙江企业在 224 个项目中投资了 77 亿;2002 年 8 月,在浙江的近邻——江西、安徽,浙江企业在 287 个项目中投资了 247 个亿;2003 年 8 月,浙江企业又在青海的 100 个项目中投资了 20 多亿元;2004 年 6 月,浙江企业在重庆的 103 个合作项目中投资了 134 亿元;在湖北的 176 个项目中投资了 374 亿元。省政府先后出台了“两个推动”战略、《关于浙江省参与西部大开发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鼓励浙江企业走出浙江外出创业,并与兄弟省市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协调会议制度,通过加强政府部门间的沟通,及时解决浙江企业外出创业投资面临的问题。

(五) 在外投资创业的阶段划分。在外投资创业包含浙江人与浙江企业外出创业两方面的内容。浙江人与浙江企业外出创业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各具特色的现象。浙江人外出创业是个人行为,属于人口流动的范畴,而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扩张是企业行为,属于企业地理的范畴。两者的起因、表现的形式、发展的趋势各不相同,但是浙江人在外地创办的企业往往被认为是浙江企业,而浙江许多中小企业在省外的投资往往是以企业家个人的投资创业行为体现的。在很多情况下,浙江人与浙江企业的外出创业活动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对浙江人与浙江企业外出创业的经济分析,既要明确不同创业形式的区别,又要有综合的解释。

浙江人外出创业是一种典型的由于经济原因而引发的人口流动现象。无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生存压力导致的外出务工经商，还是近年来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而进行的外出投资，经济因素是促使大量浙江人外出创业的主要原因。只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浙江人多地少，导致人口外出的推力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自 90 年代以来，外地广阔的发展空间形成的拉力成为浙江人口外出的主要原因。但是 浙江的人口外出与四川、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人口外出最大的区别是，四川、湖南等省的外出人口主要流向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的特征十分明显，而浙江的外出人口往往分布在全国各地，经商创业的比重比较大。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浙江企业外出创业的历程，结合邓宁的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理论 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见表 1）。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年 浙江省人均 GDP 只有 331 元 人均不到 50 美元，说不上有什么对外投资，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也很有限。1989 年 全省人均 GDP 达到 2009 元 不到 250 美元。所以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投资很少，但是由于政策的放松，大批浙江人开始外出创业。1992 年 浙江人均 GDP 达到 3187 元 接近 400 美元。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些浙江企业开始进行跨区域投资。1999 年 浙江人均 GDP 达到 1450 美元。因此，近年来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投资开始增加，有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走出浙江进行跨区域扩张。一般来说，跨区域投资跟对外直接投资相比，门槛相对较低，起步的标准也要低一点。但是，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表明，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扩张，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而且，随着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浙江企业的对外投资将会进一步增加。

表 1 浙江经济发展与在外浙江投资创业

项 目	1979—1991 年	1992—1999 年	2000—2003 年
人均 GDP(元)	417—2540	3187—12037	13461—19730
人均 GDP(美元)	50—306	384—1450	1662—2377
浙江人 外出创业特征	由于生存压力导致的外出务工经商	投资、创业，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	投资、创业，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
浙江企业 跨区域投资特征	以企业联营为主，基本上没有跨区域投资	开始跨区域投资，并逐步增加	跨区域投资明显增加，生产性投资增多，投资规模较大
典型企业	纳爱斯、雅戈尔、金洲	桐庐皇家实业公司、娃哈哈集团、万向集团	华立集团、纳爱斯集团

二、在外投资的原因分析

（一）在外投资的类型。在外投资创业的类型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类，这里我们仅从投资动机这个角度进行分析。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 8 种类型：

1 市场导向型。商品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和向外扩展，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浙江人或浙江企业为了实现更大的盈利，确立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来巩固或扩大原有市场 开辟新市场 避开各类贸易壁垒 直接在当地创办市场 活跃了当地的经济。如义乌人在各地办分市场，各地市场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相呼应，大大提高了

义乌“神州第一市”的知名度，每一个市场都是义乌市场的延伸和扩展，并由此结成了覆盖全国各地的销售网，巩固了义乌全国小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

2、自然资源导向型。资源的短缺不仅约束了浙江宏观经济的发展，也限制了浙江企业的快速成长。一些企业为了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自然资源，突破资源的约束，不得不走出浙江，开发投资所在地的自然资源。这类投资大多投向于浙江比较短缺，而相对于中西部来说却较为丰富的资源，如矿产、农业、能源等，它是对外投资中最常见和最初级的一种形式。如浙江水晶厂在内蒙古、云南、江西、陕西、河北等地合资或承包了 10 多家水晶生产企业，使年生产规模达到 500 吨左右，占世界水晶总产量的 1/3。

3、劳动力资源导向型。浙江有一些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浙江劳动成本的迅速上升，这些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降低成本，保持相对优势，于是通过直接对外投资，把费时费工的生产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便宜的地区，通过国内分工来获取比较成本优势。如在重庆，由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牵头，联合其他企业投资 10 亿元打造的“西部鞋都”已正式奠基，希望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市场复制一个“温州鞋都”。

4、技术管理导向型。浙江很多企业通过向技术先进的地区投资，在当地建立研发机构或技术公司，作为科研开发和引进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设计的前沿阵地，以打破竞争对手的技术垄断和封锁，获得一般方式不易获得的高级技术和知识资产。目前，浙江在上海兴办的企业已超过 5 万家，总投资规模达 500 多亿元。许多浙江企业明确表示，上海的人才、信息、资金等诸多生产要素，是吸引他们把企业的研发中心、决策机构放在上海的主要因素。如设在上海徐汇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里的正泰上海技术研发中心，每天通过网络把收集到的最新国内外低压电器产品信息发送到位于温州乐清的总部。3 年来，这个研发中心共为集团开发了 100 多项产品，起着孵化器的作用，在与国际接轨的最前沿给正泰提供了技术支撑。

5、资本运作导向型。浙江一些大企业紧紧抓住国企改革的契机，采用资本运作的有效手段，兼并收购当地企业，以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如华立集团，进军西部的第一动作是整体收购兼并了重庆电表厂，并很快使处于困境中的该厂焕发生机，次年便扭亏为盈，去年实现销售收入两亿多元。此后，华立集团又出资 3000 万元收购了在深交所挂牌的重庆川仪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资产置换，使公司提前摘掉 ST 帽子，随后华立控股逐步推行多元化发展战略，打造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青蒿素产业链，并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誉。

6、长期综合效益导向型。一些管理科学、资金技术雄厚的大型企业，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挑战，采取积极行动走出去，寻求发展的机会。这类企业大多以各地市场为目标，有计划地安排投资、生产、销售和技术开发等业务活动，从而获得长期的经营效果。如娃哈哈集团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出资 4000 万元兼并重庆市涪陵区三家特困企业，企业本身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目前该集团已在 21 个省市建立了 28 个生产基地和 38 家子公司。

7、环境污染转移导向型。环境污染是威胁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一些地区迫于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严格限制污染企业的发展，从而促使这类企业向外地转移。如浙江平阳县就将皮革业的初加工产业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的原料产地。

8、政府引导型。为了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口支援与对口帮扶工作。浙江不少企业实施带有援助性质的对外投资，对于促进省际产业

合作，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各种类型都仅是从单一因素进行考虑，事实上，各类对外投资类型往往交叉，是多种类型的复合。

（二）在外投资的原因分析。浙江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除了部分政府主导的经济协作以外，当前主要的形式是跨地区的投资和跨地区的要素流动。

跨地区投资和要素流动产生的首要前提是地区之间的开放。区域开放同时涉及到两个层次上的对外开放：一个层次是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开放，另一个层次则是对国外的开放。在经济开放路径上，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珠三角是先国际化而后区际化，而长三角走的是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路径。对于一个地区而言，开放不仅是双向的，即要素和资本相互流动，而且是双重的，既有国际开放，同时面临区际开放。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行政区划分割，导致长期以来中国许多地区区际开放落后于国际开放。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区际开放进程加速。

浙江的跨地区投资和人员跨地区流动无疑是长三角地区的代表。表现在投资上，浙江的国际开放程度与区际开放程度差异非常明显。在国际投资中，浙江的情况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平均情况接近。从浙江省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FDI）的统计资料（见表2）看，在国际投资中浙江资本的净流出量为负，而且流入量与流出量之比不足1: 0.02。这一水平虽然高于全国FDI流入量与流出量之比，但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 0.06。但是在区际开放中，却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资本输出地。虽然国内跨地区投资的统计数据奇缺，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在国内的跨地区投资中，浙江呈现较大的净流出量，数值在百亿以上。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

表2 2000—2003年浙江省FDI流入与流出简表

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实际直接 利用外资	境 外 投 资		净流出量	流入量与 流出量之比
		境外投资总额	其中中方投资		
2000 年	161266	—	1514	-159752	1: 0.0094
2001 年	221162	3856.32	3350.55	-217811.45	1: 0.0151
2002 年	316002	6363.67	5131.92	-310870.08	1: 0.0162
2003 年	544936	9658	8513	-536423	1: 0.0156

1、浙江跨地区投资与要素流动是浙江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1979年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曾经对67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在400美元以下时，基本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当这个国家的人均GNP在400—1500美元之间时，会开始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在1500—2500美元之间时，这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不断增加；在2500—4750美元之间时，这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快速增加。

尽管邓宁的研究是针对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但是，其思路也可以用来分析浙江的跨地区投资与要素流动。浙江省的人均GDP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达19730元，按年

末汇率折算为 2385 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的话，估计更高。如果据此简单套用邓宁的投资周期分阶段理论，浙江省应该处于投资周期中的第 3 阶段，也即资本流出逐渐快于资本流入，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的阶段。如果用今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简称 IMD）对外公布了《世界竞争力年鉴 2004》（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简称 WCY）的最新排名结果 浙江省列在了第 19 位，若以此为标准判断，浙江省应处于投资周期中的第 3 阶段 或第 4 阶段的初期，即已经出现净流出量。

由此，我们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认为一个地区出现资本的净流出，是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尤其是当这一地区与周边地区形成比较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时的结果。因此，浙江的跨地区投资与要素流动，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2 从投资主体看，浙江跨地区投资与要素流动源于浙江的体制优势。由于我国体制的原因，长期以来，各种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浙江在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区域内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又恰恰得益于民营经济主导下的各种要素在体制夹缝中的跨地区流动。这种跨地区流动过程中，既有跨地区投资的形式，又有伴随浙江人流动出现的商品、劳务或服务的流动。1999 年以后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进一步加快了浙江人和浙江资本在国内的流动速度，尤其是资本的跨地区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此外，近年来浙江产业结构的调整，大企业的成长，也成为跨地区投资的原因之一。一部分民营企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民营企业在融资、研发等方面的客观需要，也迫使其投资转向以上海为代表的国际化大城市。

3 跨地区投资和要素流动的发展与浙江省的资源禀赋结构和市场结构相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主导生产力布局的格局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企业有了自主选址经营的可能。浙江省自然资源贫乏 缺铁、缺煤、缺油、缺大宗原材料 被称为“资源小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能源、原材料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省内经济的迅速发展 企业不断增加 已有企业成长扩张的需要和新增企业发展的需要交织在一起，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供求缺口越来越大，造成各类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企业转而向要素价格相对便宜的地区进行投资与生产。以浙江省内的工业企业为代表，在省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地区内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制约，于是把生产地转向能源、原材料供应充裕的地区，比如浙江一些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建设了黄磷基地、水晶基地、皮革基地等等。

浙江省内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势头，其中土地价格的上升尤为惊人。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 0.6 亩 为全国平均的 48% 各地经济发展中普遍遇到了工业用地紧张甚至供不应求的局面，价格逐年攀升，加上近年在各类经济园区的规划中倾向于引进大中型企业，导致不少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用地难”的困境。于是，在各地的招商引资热潮之下，不少中小企业转而到异地创业。

4 浙江跨地区投资和要素流动与传统“重商”文化长期熏陶有关。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大量的浙江人、浙江企业外出创业具有共同的文化底蕴。浙江区域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自唐宋以来 浙江就一直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 杭州、宁波和温州等地一直是繁华的商业都市。古代浙江的许多思想家具有倡导功利、注重工商的思想，如永康学派的陈亮认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主张农商相补；永嘉学派的叶适明确反对义利两分，提出要“通商惠工 经国家之力扶持商贾 流通货币”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歧视商业的

观念，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反映了浙江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反过来又成为浙江“重商”文化的重要源流。受这种商业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自古以来，浙江人就被认为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与务实的群体性格。

由于临海靠山，浙江区域文化兼具了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点，从而使浙江人既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韧劲，又有海边人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胆略。而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理格局，人口密集造成的生存压力使浙江许多地方（尤其是温台地区）的老百姓淡化了安土重迁的观念，敢于并乐于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漂洋过海闯荡世界。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浙江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形成了区域性的产业传统如东阳的泥水木匠、永康的铁匠、义乌的敲糖帮、台州的绣花女、温州的皮鞋匠、永嘉的弹棉花郎等等。这些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加上头脑灵活、善于经营的个性，成为浙江人外出谋生传统的坚实基础。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浙江人、浙江企业的外出创业，都充分体现了历史文化因素的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逐步放宽对各类经济活动的管制，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异，激活了浙江人一度被压抑的创业激情。大批浙江人凭借着对市场、对商机的高度敏感凭借着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走出浙江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因此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沿海省市相比浙江外出经商创业的人口往往更多。

文化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竞争力是一个地区最根本、最难以替代和模仿、最持久的核心竞争力。在浙江人、浙江企业外出创业的过程当中，充分体现了浙江文化的影响。区域人文精神往往决定区域人口的素质。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有什么样的劳动态度和创业精神。浙江精神、浙江文化培育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企业家他们既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又能够承受创业活动的辛劳不断创新。

三、在外投资对投资所在地及浙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投资所在地及全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在外投资创业本质上是浙江人或浙江企业以资本流动为纽带，将其拥有的各种资财优势与投资所在地的各种区位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寻求资源最佳配置且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跨区域经营活动。在外投资的结果是既发展了当地经济，又为浙江经济延伸了产业链，拓展了新空间，真正实现了浙江与投资所在地的双赢。随着在外浙江投资的迅猛发展，浙江对全国经济的积极影响日益增大，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 加速了投资所在地的资本形成，直接推动了投资所在地经济的增长。在外投资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资本流动和资本形成，它直接拉动了资本流入地的经济增长。北至黑龙江，西达新疆，南到海南，都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共有 400 万在外创业人员创办各类企业 9 万家 投资额 5300 亿元 200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 万亿元 在外浙江人创造的产值，对全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外浙江投资之所以具有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贡献主要是因为：首先，在外浙江投资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促成了投资所在地资本存量的增加，从而有助于弥补投资所在地的期望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流入的资本直接形成了生产能力，对投资所在地经济起到了“输血”的作用，直接推动着投资所在地的资本形成和 GDP 增长。其次，在外资本的注入可以改善投资所在地的资产质量。在外浙江直接投资可以

通过投资新建项目或对项目连续追加投资来增加投资所在地的资本存量，也可以通过兼并投资所在地的企业，盘活其存量资产和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对投资所在地的资产进行改造，通过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来增加投资所在地的资本存量。第三，在外投资可以成为引发投资所在地投资的催化剂，提高国内投资者的信心，引发相关投资。

另据资料显示 在中西部地区 约有 1/4 的资本总额要靠资本流入来弥补，而在东部地区，区域内资本形成总额的 5% 可用于资本输出。由此可见，投资所在地通过引进在外投资突破了自身资本条件对其经济发展的限制，使资本存量增加，资产得到了更合理的配置和利用，从而拉动了投资所在地的经济增长。

2 为投资所在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投资不仅有助于解决资金匮乏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可以吸收大量的失业人口就业，起到提高经济福利和稳定社会的作用。浙江人在外投资对投资所在地的就业贡献通常表现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提高就业质量。浙江人在外投资雇佣了当地的劳动力，直接为投资所在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通过投资企业广泛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可以为投资所在地供货商、销售商和服务代理商创造就业机会。此外，在外浙江投资企业在当地的支出加上税收，通过乘数效应，增加了投资所在地的国民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也间接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例如近十年来，浙江共在新疆投资开发建设项目 5000 多个 投资总额 60 多亿元人民币 吸收当地就业 15 万多人次 交纳各种税费 10 多亿元 为新疆经济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综合来看，浙江人在外投资对投资所在地就业带来的直接与间接贡献是较为明显的，可以肯定随着对外投资总量的扩大，会不断增加对投资所在地劳动力的需求，也就意味着对投资地就业贡献还将进一步增大。

3 加快了投资所在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步伐。经济发展不仅要求总产出不断持续地增长，还涉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变迁，我国中西部多数省份不仅存在着产出水平低、增长乏力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其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乃至畸形发展。在这些省份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在外浙江人的投资对投资所在地产业结构演进的贡献要比对浙江本省更为明显，它直接推动着投资所在地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浙江人在外投资对投资所在地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资本、技术等“一揽子”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资产和管理技能的流入，可以改变投资所在地的投资结构，不仅有助于投资所在地建立新兴产业，还能使传统产业升级；二是因为浙江人投资流入而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使得投资所在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改变了投资所在地的消费结构，从而间接地促进了投资所在地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三是在外浙江投资企业进入投资所在地而对当地企业所形成的竞争与示范双重效应，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投资所在地产业结构的优化。这是因为浙江投资进入之前，投资所在地的许多行业要么是空白，要么只能生产少数中低档次的产品。由于缺少竞争压力和技术进步的刺激，技术与产品更新缓慢，浙江投资进入后，可以使产业结构的提升体现在生产、营销的各个方面；四是在外浙江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对投资所在地居民消费需求所带来的引导作用，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投资所在地产业结构优化。

4 培育了投资所在地进入国内外市场的营销能力。投资所在地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充裕且成本低廉，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销售产品时通常会面临一系列难题：如建立营销网络和制定营销策略；适应国内外消费品市场偏好变化的能力；了解国外关于产品的检验、规范和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宣传和树立产品形象等。在竞争激烈的消费品市场

中产品的设计、包装、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产品本身。这些技能的缺乏给投资所在地企业的产品销售构成了关键性的市场进入障碍。与投资所在地企业相比，在外浙江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营销能力和大量的新市场信息，不仅可以为投资所在地提供符合国内、国际惯例的市场进入渠道，而且还可以引导投资所在地企业的行为，消除其进入市场的障碍，增强其进入国内外市场的能力，迅速扩大投资所在地产品的销售规模，从而为投资所在地的国内外市场开拓和扩张做出积极贡献。

浙江在新疆的投资活动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浙江人的商业触角几乎延伸到了新疆的所有角落。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浙江人经营的批发市场、酒家占到了全市的近 1/3。在新疆南部喀什，商业贸易几乎为温州人所独占，有 120 家温州人创办的企业在这里从事商业、贸易和房地产开发，他们还把贸易做到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

5 促进了投资所在地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一个地区经济及工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学家称之为发展的命脉。投资所在地通过引进浙江投资往往能有效地引进适用的技术和研究发明能力。这是由于，首先，浙江投资使投资所在地可以借助多种方式提高研发能力，获得适用的技术和研发成果。例如，投资所在地可以借助浙江企业在体系外部建立开发和技术合作网络，学习和掌握浙江企业的研发成果，也可以在浙江投资企业的非股权投资方式或合作生产方式下，获得浙江省的适用技术与知识，包括项目设计、产品规格、制造技术、质量监控及管理技能等各方面的先进技术与知识。通过引进浙江投资直接引入适用的技术与知识，不仅能节省科研费用，而且能节约研制时间，取得跳跃性的发展。其次，浙江投资对投资所在地带来的技术进步往往还包括在外浙江投资的溢出效应和外在效应。这些效应指投资主体在从事生产或其它经济行为时自然输出技术及引起的技术提高，并非有意转让和传播。水泥技术进步的例子就颇有代表性，进入 21 世纪后，新型干法水泥产业在国外迅猛发展，浙江民间资本承担了全国水泥业裂变的助推器，约百亿民间资本纷纷加入这一领域，形成了足迹遍布全国 26 个省、市、区的投资格局，催化了全国水泥产业的裂变，使新型干法水泥在全国迅猛发展。

6、提升了浙江顾全大局和富有社会责任意识的社会形象。近年来，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在理论上，有两种机制可以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别。其一，随着市场的发育，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各地区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区域贸易，以充裕的生产要素换取稀缺的要素。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生产要素价格和报酬趋于一致。其二，随着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生产要素在各地之间流动，从而改变生产要素占有水平不平衡的状况。那些市场障碍较小，流动性较强的要素通常率先流动起来。

实际上，在外投资已经包含了以上两种机制，浙江人和浙江企业通过走出去，一方面主动参与服务西北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振兴，为投资所在地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浙江人和浙江企业在投资创业过程中也充分展示了浙江顾全大局、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博大胸怀，为浙江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体现了浙江的全局意识和社会政治责任。虽然这些不能完全用经济效益来衡量，但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

（二）在外投资创业对本省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区域间资源的流动、经济的交往，本质上是一种互相合作、互相促进的关系，其利益是相互依存的。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发展在给